

论高度复杂性条件下的行动方针

张康之^{*}

【摘要】 在全球化与后工业化时代,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也以风险社会的形式呈现给了我们。在这一条件下,如何开展行动以及如何通过行动而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是需要首先确立起基本的行动方针的。近代以来的社会建构是在同一性、普遍性的原则下进行的,也在形而上学的思考中确立了社会建构的起点——抽象的、原子化的个人。其实,社会并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存在,而是包含在人的生活和活动之中的。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就是包含在人的生活和活动之中的社会特性,对人所提出的是人的共生共在的要求。基于人的共生共在的社会建构将会在理论上实现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超越,也将在社会实践中彻底终结旁观者与行动者的区分,并把每一个人都集结到行动过程中来,出于人的共生共在的目的开展行动和实现社会建构。

【关键词】 复杂性;不确定性;全球化;后工业化;共生共在;合作行动

种种迹象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前进的脚步已经迈入了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进程中。回顾工业化进程,在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地区,人类都是通过暴力开辟道路的,是踏着血腥的泥土进入了工业社会的。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进程中,人类是否依然要用鲜血染红前进的道路呢?这是一个不能不去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提出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人类历史就依然会表现为一个“自然历史”进程,就必然会复制那段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果若如此,人类的前景将是难以设想的。因为,在人类所建构起来的工业文明中,包含着先进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们可以在顷刻之间毁灭人类。那样的话,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的步伐也将就此而停止。如果人类历史就此止步的话,也就没有什么后工业社会了。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目的是要探寻一条不同于工业化进程的后工业化道路,唯有保证这条道路是和平的和吉祥的,人类才会走进后工业社会。就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时代而言,显然会有着不同于以往的诸多新特征。事实上,在这样一场人类历史上的又一次伟大社会转型运动中,伴随着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正是人类社会的这一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表明这一次历史性的社会转型比以往任何一场社会转型运动都包含着更多的风险。因而,我们必须认真地思考人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需要为人的行动确立原则和制定方针,以求人类能够平稳地度过这一社会转型期。

^{*} 哲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服务型政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210036。

一、人类在全球化、后工业化中的境遇

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人们开始把近代以来的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笼统地归于“现代性”的名下,以至于形成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两种观察视角,或者说,学者们是通过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去对社会存在进行分类的。关于现代性的特征,鲍曼所作出的描述是,“现代性力图消除偶然事件和随机事件。……这种意图在意外事件和偶然事件出现的地方添加规定;这种意图使模棱两可的事物变得一清二白,使不透明的事物变得透明,使不能预测的事物变得可以预测,使不确定的事物变得可以确定;这种意图把公认的目的插入到事物中去,并因而使它们努力实现那一目的。”^①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去使用“现代性”抑或“后现代性”的标识,在我们的视野里所看到的是可以依据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去划分的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近代以来的社会呈现给我们的是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而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的社会则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这决定了人们在开展行动的时候,必须根据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状况去选择行动策略。

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鲍曼所说的这种透过偶然事件和随机事件去发现必然性的做法是可行的,也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功。可以肯定地说,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所取得的几乎所有伟大成就,都应当归功于这个历史阶段中所拥有的这种透过偶然事件和随机事件去发现必然性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思维方式,让人们在纷繁的表象背后去发现抽象的、普遍性的存在,去从不确定性中去发现确定性,从而打通了已知与未知之间的逻辑通道,并赋予了人们以极大的征服自然和驾驭社会的能力。但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这种思维方式陷入了困窘状态。也就是说,这种思维方式已经不再能够赋予人能力,反而使人的能力受到了削弱,让人在瞬息万变和无法分解的事件面前变得无比迟钝和呆板。特别是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又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维护既有思维方式的愿望,不愿意卸下已经背负在肩上的各种各样的包袱,从而使人的行动都显得非常被动。比如,在危机事件频发的状态下,人们不是按照应对危机事件的思路去寻求行动策略,而是在传统的管理模式中去寻求所谓危机管理的行动策略,试图去预测危机事件,甚至不无荒唐地去制作所谓危机预案。这说明,人类在喜好必然性方面中毒甚深,不愿意接受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推展出来的偶然性,更不愿意用随机的行动策略去应对那些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这显然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做法,也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承认偶然性是开展行动的必要前提,只有在承认偶然性的前提下,才能走向寻求正确的应对策略之方向。

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是全球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的两个面相,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长期以来,人们所寻求的是确定性。虽然人的意识是不确定的,但当人面对自然的时候,却更倾向于寻求确定性,而且,已经凝固为一种模式化的思维方式,并施行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整个社会治理。昂格尔说,“由于人在自然中并没有被预先确定的地位,他就必须为自己在其中找到一席之地。在这样做时,他并不满足于将自然世界看作是实现其目的的方式的来源。他希望将自己看作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属于一种自然秩序,拜意识所赐,他被这种秩序抛弃了。作为自然之整体的一部分的感觉,正如它与自然分离的经验一样,也深深地植根于自我之中。”^②因此,谋求确定性也就成了一种似乎是恒定的追求。然而,当自然以及社会的不确定性都达到了很高程度的时候,一切谋求确定性的追求都变得枉然无功,以至于不确定性相对于人而言,成了深陷其中的困境。所以,我们总是看到这样一幅图景:

① [英]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邹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页。

② [美]昂格尔:《知识与政治》,支振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91页。

“所有人类的行为都意味着去改造世界,并且的确改造了世界,哪怕实际所获得的改变与原打算做出的改变并不一样。由于自我的不确定性与有意识性,人的世界并非已经被完整构建了的,并且他的每一个行为都将其形式向前推进一步。”^①可是,当自然与社会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呈现给人时,人的行为的形式化也可以宣告说走到了终点,不再有进一步强化的空间了。所以,在应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问题上,对人的行动也就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可以相信,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将在行动中反对一切形式上的同一性、普遍性,转而致力于具体的回应性和适应性,而且这将成为人的行动模式建构的基本原则。

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也以社会构成因素的多元化这一形式表现了出来,并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差异化的社会正在生成的客观趋势,进而要求我们按照这一多元化和差异化的现实去作出社会以及社会治理的安排。但是,在形成多元化的思想观点时,无疑是以工业社会的同一性追求为参照系的,一旦一个差异化的社会已成现实,那么多元化的概念也将失去意义。反过来说,也正是20世纪后期出现了多元化的追求,才使工业社会的同一性追求所具有的那种专横面目暴露了出来。“只有在多元性的声音中,理性的同一性才是可以理解的。”^②既然近代以来的社会建构都是在对同一性的追求中进行的,以至于同一性成为一个默认的原则,那么在面对差异的时候,也就会表现出自然而然地趋向于同一性的行为选择。除了少数哲学家(如黑格尔)去自觉地探讨同一性以及同一性是如何表现为普遍性的问题,一般说来,人们都是把同一性追求作为自然而然的事情接受了下来,或者说,默认了同一性追求是一切行动赖以展开的前提。然而,当多元化的声音开始回荡时,人们却发现,同一性追求构成了无法打破的话语霸权,成了一种思维定势,甚至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也去按照同一性的思维定势追求全球在制度以及社会治理上的同一性。即使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已经明确地证明这种同一性追求是不可能的,同一性追求的思维定势也仍然被固守不放。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将人类引入了风险社会。现在,到了必须正视多元化要求的时候了,必须根据多元化的理念去重构我们的社会。只有在多元化的理念得到实现的时候,多元化的概念才会失去意义和不再被人们提起。

福克斯和米勒描绘了我们时代中的政治学境遇:“政治学现在是个庇护词,像高速公路的转弯符号,指引大家去别具特色的各种汽车旅店,在那里,许多零散的群体逐渐相聚在一起。部门的扩散,同样还有各种人文学科的增加,都是这方面的证据。另类的杂志开始提供不同的特色、方法论甚至意识形态。在学科碎片化的状况下,已不可能有人再获得全国性的声誉了……”^③。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些政治学家们抱着那些普遍性的东西不放,甚至宣称存在着什么普世价值,目的其实只是想去夺取或保住自己的“全国性声誉”。而在后发展国家中,一些人这样做也许是为了在对发达国家的话语依附中去捞取好处。事实上,一个多元化的、多样性的世界正在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去关注面对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行动策略,至于抽象的、普遍性的原理,谁也不会在意。诚如福克斯和米勒所说的,“学科分支的发展并不必然地是库恩所描写的不可克服的范式的不相容性的证据。更确切的标签是准不可通约。分离的、部落化的话语社会由于漠视或文人相轻以及在基本的认识论层面范式的不一致而彼此分离。个人的认同越是与亚文化的碎片联系在一起,这一认同就越易被更为精密的社会构型所取代……”^④。在这种条件下,任何谋求话语霸权和依附话语霸权的追求都是不切实际的,反而会让人看起来是一种疯疯癫癫的状态,或活脱脱地就是愤青。在具体情境中的具体行动高于一切的时代,每一个人对共同体的存在所能作出的贡献就在于切实地融入到具体行动之中去,用具体的行动去表达对人的共生共在的关注。福

① [美] 昂格尔:《知识与政治》,第292页。

② [德]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39页。

③ [美] 查尔斯·J·福克斯、休·T·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楚艳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0页。

④ [美] 查尔斯·J·福克斯、休·T·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第61页。

柯说“想到人只是一个近来的发明,一个尚未具有200年历史的任务,一个人类知识中的简单褶皱,想到一旦人类知识发现一种新的形式,人就会消失,这是令人鼓舞的,并且是深切安慰的。”^①虽然福柯的思想所凝练成的这一显然夸张的表述让人不愿意接受,但作为社会化了的和更少自然属性的人却确如福柯所说的那样,是在现代化过程中降生的,是科学的发展而用知识武装了人,让人有了思想和愿意了解各种思想,去比较各种理论并从中做出选择。正是这种人,有了根源于自身的成长动力而不是由外在性的因素促使其进化。最为重要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降生的人能够投入到改造世界的行动之中,尽管每个人的思想、言语和行动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却能够汇成一种巨大的推力。每个人在知识的获得和思想的不断矫正中实现着对自己的否定,所汇聚的力量则实现了对社会以及社会治理的既存状态的否定,一步步地逼近一种全新的构型。福柯是在20世纪60年代作出上述判断的,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人类进入全球化和后工业化进程时,很快就显现出了“人的消失”,此时的人更多关注的是制度模式、社会治理体系以及全新的社会构成要素,而对人的关照似乎被忘记了。然而,这种“人的消失”恰恰是人的实现,是要把全部社会空间都改造成适应于和从属于人的自由、自觉和自主的生活框架。所以,福柯所说的“人的消失”是指那种有了自我意识从而发现受制于各种各样外在性因素的人将走向消失,而“新人”将再次降生。所以说,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制度等社会设置的关注并不合乎现实的要求。我们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进程中所遇到的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它不仅不成为“人的消失”的条件,反而意味着完整的人的回归。其实,也只有完整的人才能成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者。因为完整的人能够深深地感受和理解人的需要,会把他人与自我的共在看作最高原则,并基于这一原则去作出行为选择。因此,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困难、复杂性和矛盾的增加和多样化,几乎从逻辑上源于个人和集体行动者的自由和自治的增加。不能将它们进行彻底的更改,也不能通过一根魔棒来用控制的方法加以解决,而应通过集体建构的整体加强和有意识的整合才能奏效,使所有领域的社会行动在各方面井然有序,并在事实上成为可能。”^②

二、从抽象的、原子化的个人到人的共生共在

在社群主义看来,“个体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没有语境的话,个体将会是不可想像的——无所谓相貌、无所谓性情、无所谓性格、也无所谓个性的闪现。情境的这一切换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社会提升到,尽管不是绝对的第一性,至少也是同等的因果第一性的位置。”^③尽管这样评价社群主义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其显然是要表达一种对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的那种从抽象的人出发去提出社会建构方案的不满,而是要求在具体的情境中去把握人,进而从具体的人出发去构思社会建构方案。当然,这个具体情境中的人是什么样子,应当说,社群主义者也是不清楚的,他们所能给予的仅仅是“亚里士多德的关于人是社会或政治的动物的观点,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秩序良好的健全社会(城邦)中才能实现。这种精力更为充沛的自我身上留有过去经验的印记,它没有抽象的、原子化的、自主的个体所具有的绝对自由意志。”^④这说明,社群主义者有着一种积极的重新界定人的追求;也说明,自20世纪后期起,由于重构社会的问题凸显了出来,学者们开始反思近代以来作为社会建构基础的“抽象的、原子化的”个人,并要求对人作出新的认识和理解。但是,全球化和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转型并不一定按照传统的逻辑去设计社会建构的路径,也就是说,并不一定必然要从对人的界定出发去设计社会建构的方案,而是需要从人的既存事实出发去构想人的行动。

① [法]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前言第13页。

② [法] 克罗齐耶、费埃德伯格:《行动者与系统——集体行动的政治学》,张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③④ [美] 查尔斯·J·福克斯,休·T·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第33—34、33页。

我们看到,自从18世纪后期出现了“社会”这个概念之后,人们一直是把社会当作一个实体性存在对待的。实际上,社会从来都不是一个实体存在,而是人的生活和活动空间,或者说是人的生活和活动的状态,是包含在人的生活和活动之中的。正是因为把社会看成了一个实体性的存在,所以人们希望为社会建构寻找到一个原初的起点,从而找到了抽象的、原子化的个人。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是包含在人的生活和活动之中的一种形态,是人的生活和活动的一种状态,那么,社会建构的逻辑就不需要寻求一个终极性的出发点了。特别是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发现,社会作为人的生活和活动空间形态越来越显性为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或者说,社会是包含在人的生活和活动之中的,而不是独立于人的生活和活动之外的存在。这样一来,我们所看到的社会所具有的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性,一方面,人的生活和活动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的;另一方面,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其实就是包含在人的生活和活动之中的。结果,也就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人的行动,而人的行动在目的上则是指向人的共生共在的。以此则可以发现,在把“抽象的、原子化的个人”改写成“具体的人”时,它所反映出来的仍然是近代以来的社会建构逻辑,也就是说,依然是在把社会作为一个实体性存在的前提下去寻找社会建构的出发点的,而不属于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创新方案。从福克斯和米勒所指出的社群主义与近代以来的理论的不同点也可以看出,他们仅仅是在与近代以来的理论相对立的意义上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建构思想。福克斯和米勒说,“如果说传统治理模式的主要问题在于假定了一个意志自主的个体和对处于实际境遇中的个体的抽象,社群主义与之平行的问题是假定社会是至善的或基本上完善。”^①这无疑是一种简单的颠倒。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进程中去思考未来社会建构的问题时,仅仅作出这种简单的颠倒显然是不够的,而是需要从根本上抛弃近代以来的社会建构逻辑。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再把社会看作是由人所构成的,而是应当看作为人的生活和活动空间,是永远处在一种不定型的状态之中的,是需要由人的行动去加以诠释的一种状态。所以,社会无非是人的行动的形式,而人的行动则是为了人的共生共在,至于人是原子化的个人还是具体情境的综合体现,都不是理论必须去作出回答的问题。总之,人在这里是目的而不是出发点,而且,作为目的的人只有在人的共生共在之中才具有现实性。因此,福克斯和米勒在揭示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区别时指出,“现代自由主义以自我的理解假定了一个原子化的(资产阶级的)个体,这个个体能理性地将价值最大化,并将其附着于个体孤独的自我之上。”^②与自由主义的传统不同,社群主义要求把个人置于社会整体的系统中来加以认识。在社群主义看来,自由主义所“假定的‘自我’是完全不能实现的。这样一个空洞的自我,没有文化、没有历史、没有境遇。它不是具体的,而是一个抽象的自我,一个在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中的‘我思’之后流行的非具体的理论推导物。”^③的确,近代以来的整个社会是根据自由主义的方案建构起来的,指出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不同甚至对立,显然是出于探求一种新的社会建构方案的追求,但是,如果说把新的社会建构方案寄托于社群主义的粗浅论述中,那显然是不成立的。从20世纪后期以来的情况看,人们并未在这样一个改革的时代给予社群主义以关注,这本身就说明社群主义并未提供切实可行的社会改造方案,而且它在理论上也没有独立的建树,因为它的理论逻辑依然是自由主义逻辑和社会建构思路的翻版,只不过在前提上作了一些稍稍的改动,并不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思路。

自由主义理论不仅假定了抽象的、原子化的人,而且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从属于利益追求的。在自由主义以及其后的几乎所有变种中,都包含着以个人利益追求为基本内核的思维路径。根据这种思维,也是可以推导出公平原则的,因为人们会将自己置于社会这个重复博弈场中,会理性地衡量公平,会理解适度的利他对于自我利益实现的意义。但是,这是一种在现实中十分脆弱的逻辑,往往会在博弈中变得失望,公平的追求总被非公平的现实所摧垮,尽管可以通过意识形态以及物化设置去保

①②③ [美]查尔斯·J·福克斯,休·T·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第34—35、33、33页。

障公平,也难以获得所期望的效果。如果不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而是在观念中填入他在性的原则,以他在性为行为取向,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因为,在效果上就不是期望通过予他人以公平而使个人利益在重复博弈中实现,而是在基于他在性原则的行为中得到了他者的公平回报。此时的公平才是真正的公平,也是利益最大化的状态。所以,在社会建构中不应以防止和压抑自我利益实现的要求去获得公平,而是需要着眼于他在性原则是否能得以贯彻。只要他在性原则能够得到遵守并贯彻于人的行为中,获得社会公平将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否则,如果把以个人利益为中心作为社会建构的前提的话,那么不论怎样去追求公平,所获得的都是脆弱的公平。同样,从行动的角度看,如果是出于自利目的而去与他人开展共同行动的话,就必然会只看到他人的工具价值,也就是说,只看到共同行动中的人的那个有利于共同行动的部分,亦即有利于达成自己目的的那一部分,而不会将一道参加共同行动的人作为完整的人加以接受。与之不同,在合作行动中,合作者则是把共同行动中的一切人都作为完整的人加以接受的,所以,会表现出对他人的人格的尊重和对差异的包容。

当我们说工业社会中的个人利益追求是人们开展行动的先定目的时,其实是说,这个目的相对于所有人的共同性是个抽象。也就是说,作为行动目的而存在的利益在每一个人那里都是不同的,但在抽象的意义上又是可以表述为共有的。然而,在社会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后,这种抽象将不再有意义。当然,人的共生共在也会以意识或观念的形式出现,但这种意识和观念是形成并扎根于每一个人的心中的,而不是抽象的结果,也不是在逻辑推演中获得的结论,更不需要通过教育、宣示等方式去灌输给每一个社会成员。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普遍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区分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也不再可能。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拒绝任何形式的抽象,也不会把任何普遍性的因素呈现给人们,任何事件以及存在物,都仅仅把随机性的和具体性的一面暴露于外,而普遍性的一面总是神秘莫测的。所以,如果按照近代以来认识论的思维方式去把握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话,那只能说是一种迂腐的做法,更不用说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去设计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方案了。

我们也承认,基于自私的考虑也会导向利他的行为选择,但是,这种利他行为要么是出于精明的计算,要么是因为外在性的社会约束所迫使,在这两个条件不具备时,就会消失。所以,利他行为是及其脆弱的,即使稳定地和持续地发生,也缺乏坚实的基础,即缺乏一种原生性的发生器。也就是说,只要利他行为不能同时导致利己的结果,不能实现互惠互利,就不可能再被期望。所以,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进程中,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当人的共生共在的课题凸现出来,就必须超越利己还是利他的考量。进一步说,就必须把个人从思考的中心驱逐出去。因为利己还是利他都是从个人的视角出发所看到的问题,一旦我们抛弃了个人的视角,转而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类存在”出发,也就不会再受到利己与利他问题的纠缠。就理论而言,一旦我们打破了工业社会的话语束缚,利他主义将像利己主义一样,是非常有害的。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理论的宗旨在于,既不为利己主义保留思想空间,也不为利他主义作论证,对于人的共生共在而言,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主张有着同等的破坏力,都是消极的。人的共生共在不允许任何利己的冲动引发破坏效应,也不赞成任何出于维护共同体的冲动而去刻意地作出贡献,特别是不允许一切非理性的所谓“奉献”。出于人的共生共在要求的理论建构,将致力于寻求适合于人的类存在的最佳机制,并根据这种机制去确定人与人关系的科学体制,形成制度以及其他必要的社会设置。

三、在人的共生共在的主题下开展行动

“社群主义者认为,社会自身以及他人的存在是人类生活和幸福的前提。所以尊重他人、利他主

义、忠诚、依附于社会以及其他的以群体为基础的情感并不仅仅是对自我中心的理性常规的奇怪偏离，而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①但是在工业社会的社会生活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参与到行动之中去，特别是对于政治生活以及社会治理而言，一部分人是行动者，而更多的人可能是旁观者。也许旁观者是被动的被治理者，是由他人去决定他的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他遭遇的一切都不是他的也不取决于他的选择。在民主的意识形态中，每一个人都会被要求和鼓励进入政治生活以及社会治理过程中去，但在实际行动中，更多的人实际上是被限制甚至是被拒绝进入到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过程中来的。如果人们天真地相信自己是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活动的，那么他立即就会发现他实际上受到了愚弄。这一点是社群主义没有认识到的，也是没有想到的，或者说，社群主义在工业社会的结构和既定社会生活条件下提出的“尊重他人、利他主义”的情景以及社群主义所说的“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并不是对每一人都有意义的。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在工业社会的条件下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

既然工业社会把人们分成了旁观者和行动者，我们也就看到了旁观者与行动者是不同的，表面看来，人们所作出的旁观或行动的选择都是由他们自主决定的，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的，每一个行动者都会有着不得已而为之的经验，甚至会抱怨说自己是被迫而去这样做的。即使道德会对具体情境中的旁观或行动表达赞成与否的意见，而法律却更愿意对旁观或行动表示旁观。如果依据法律而对行动者的责任过失作出制裁的话，那也是因为行动导致了侵害他人的后果。而对于旁观者，法律是不可能去追究是否有责任的问题的。虽然在还原论的逻辑上总是能够推导出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生活中的行动者的结论，而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则确定无疑地存在着旁观者和行动者，特别是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活动中，旁观者与行动者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清晰的。我们说工业社会是法治社会，就法治是依据责任的确认而去开展社会治理来看，实际上是默认了旁观者与行动者的区分的。如果认真地去理解被社群主义作为批判对象的自由主义理论及其个人主义哲学的话，也可以看到，在每一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去达成自利追求的判断中，并不包含着让每个人都成为行动者的必然性。或者说，考虑到每个人的自利追求都需要得到规范这样一个问题，就会把一部分人推到行动者的位置上，而把另一部分人限定在旁观者的位置上。正是由于人们被分成了旁观者和行动者，所以才在所有的社会问题上都会有着不一致的意见，才会引发矛盾和冲突，才会把人类引入风险社会。然而当我们的思考和观察视角从人的共生共在出发时，情况就不同了。也就是说，在人的共生共在的主题下，旁观者丧失了可资为自己辩护的所有理由。人的共生共在的主题的破题，意味着不允许任何人处在旁观者的位置上，而是必须投入到行动的过程中。如果说法律无法判定旁观者有罪的话，那只能说法律本身已经丧失了合理性，已经与人的共生共在这一主题的要求相冲突了。或者说，从人的共生共在的前提出发，具有合理性的关于人的行为的规范不仅需要开展行动而且也需要对不开展行动都实现有效的制约。

全球化和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意味着人类必须把人的共生共在确立为基本主题，这是一切社会建构和一切行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往人类社会发展中曾经存在过的无论是以个人的形式还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的那种为了自我的利益实现而去剥夺他人利益的做法都会导致人类无法承受的后果，而且任何为了自我利益实现而把他人当作工具的做法也不再可行了，而是需要把人的共生共在放在首位。也就是说，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一切存在都应不以消灭其他存在为行动目标，而是需要在“他存在”中获得自我存在的支持因素。我们看到，此前人类的一切从属于利益追求的行动都具有征服的内容，在对他人的征服中直接地使自我利益得到实现。在对他人的征服变得困难的时候，在对他人的征服受到广泛诟病或受到限制的时候，人们发现了协作模式，人与人联起手来共同征服自然界。在对自然界的征服中，科学技术得到了发展，人的物质

① [美]查尔斯·J·福克斯、休·T·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第34页。

生活水平得到了提升,也因此而让人陶醉于所谓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之中。可是,人们却在不经意间突然发现,此前人类的征服行动已经来自于自然界的能源和资源消耗到了某个临界点了,已经无法持续地从自然界中去索取那些能够支持人类自身斗争和冲突的能源和资源了。毋宁说人类已经无法再将自身行为的消极后果不加考虑地转嫁给自然界了,因为自然界已经失去了接受人类转嫁过来的破坏性后果的承受力。在自然界已经不再能够接受人的各种各样的行动的后果情况下,人只有依赖于同他人的合作去实现发展,也就是说,必须把他人的存在作为自我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总之,人的共生共在已经成了人们自我存在和开展行动时无可选择的基本原则,这就要求人们必须把人的共生共在作为一种基础性的理念。唯有确立起这一理念,才能使人立足于这个多样性的世界,才能在行动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和行动方式。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来看,以自然生命形式出现的人在生存能力方面呈现出的是下降的趋势。在农业社会,个人在不求助于社会的情况下也可以延续自然生命。如果说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已经出现了人的社会生命,那么人的这种社会生命则是极其微弱的。对于人的存在而言,自然生命所占的比重是较大的,而人的社存在是微不足道的。到了工业社会,人的社会生命得以发育、成长,形成了人的自然生命与社会生命并立和相互依存的状态。可以说,人的社会生命已经成为人的存在的最为重要的部分,相应地,人的自然生命如果脱离了社会生命的话,存在下去的可能性也会大为降低,即表现出了人的自然生命存续能力下降的状况。所以,我们看到,在工业社会中,避世隐居的人往是较少的。即便如一些田野调查所发现的那样在中国的终南山存在着避世隐居的人群,他们也需要到集市上去购物以便补给他们延续自然生命的必需品。可以相信,全球化和后工业化不仅不会改变人类社会演进的这一趋势,反而会使其得到增强。这样的话,对于人的存在而言,其社会生命的重要性肯定会进一步地得到增强,而自然生命的重要性则呈现出相应下降的状态。而且,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的自然生命的维系也会更加表现出对其社会生命的依赖。

人的自然生命与社会生命在人的存在中的这种变化,也指示了人的共生共在是人的发展方向这样一条不可逆转的路径。总之,虽然人的自然生命是属于个人的,但人的社会生命则是社会的,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事实上,人的社会生命是通过人的行动化加以诠释的,是在人的社会生活和活动中而成为现实的。人的自然生命不仅不能像在农业社会那样可以脱离人的社会生命而存在下去,而是表现出了对人的社会生命的依赖。正是人的自然生命所表现出来的对社会生命的依赖,决定了我们需要从人的社会生命的角度去看人的行动。其实,在人的社会生命中是包含着人的共生共在的内容的,只不过工业社会的所有理论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已,一旦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去寻求一种从属于也服务于人的社会生命存续要求的行动模式——合作行动。人的社会生命将会赋予合作行动以无限的来自于个人的动力,而且人也必须在合作行动中去诠释自己的社会生命,进而使自己的自然生命得以维系。于此之中,人的共生共在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哈贝马斯的一个观点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无论是作为自律的存在,还是作为个体的存在,实践的自我关系中的自我都不能通过直接的自我联系,而只能通过其他人的观点来进行自我确证。在这种情况下,我所依赖的不是他人对我的判断和行动的认同,而是他们对我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要求的承认。”^①也就是说,人生活于和行动于社会之中,而社会并不是人之外的存在,相反,恰恰是包含在人的生活和活动之中的。作为个体的人的生活和活动包含和反映了完整的社会,个人只有在他人的承认中才能发现自我,才能作为合理的共同行动的参与者而存在。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这一点将变得更加明显,而且会要求从根本上把那些通过营造人的同一性和使人格式化的社会设置搬除,从而

① [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第207页。

使人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显现出来,进而布设起承认差异的整体氛围。承认差异也就是承认个体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这本身就是合作理性的体现,而合作行动也正是在承认差异的整体氛围中进行的。合作行动将表现出哈贝马斯所说的,“对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无限要求,”在这里,“个性要求得到保障,这种保障是我根据人们极端重视的个体生活计划,有意识地为我的生活历史的连续性所接受过来的……每个人都能够接受其他人的观点,并且可以相互承认,这种生活方式的理想化设想使个体的存在能够共同体化……”^①也许我们会认为哈贝马斯的这一设想过于理想化了,实际上却是非常现实的。因为,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只能在合作行动中去证明自己的现实性。在合作行动中,人们可以“通过自我批判来掌握我的生活历史,并通过反思来延续我的生活历史。只要我不能在众人眼前,即在无限的交往共同体的论坛上与自己相通,这就永远都是一种没有约束力的观念,甚至是一种不确定的观念。”^②相反,一旦我们能够实现与自己相通,也就找到了根源于自身的规范力量,也就不再会在合作行动中表现出对那些外在于人的规范力量的刻意追求。合作行动将会是马克思所构想的那种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在合作行动中不仅通过他人的承认而在合作者之间建立起了共识,而且在共识以及基于共识的行动中时时都是与自己相遇的;合作行动中的自我也就是达成共识中的自我,自我也是以一个整体的形式出现的,始终在合作行动中在场,再也没有旁观者与行动者的区别。也就是说,合作行动将不再会出现任何对人的制度化排除,反而是在合作行动中去建构制度,或者说,制度就是存在于合作行动之中的,一切置身于合作行动中的人,都获得了制度化在场的资格,因而不会缺席。每个人相对于他人的“没有约束力的观念”,或者说,每个人的“不确定的观念”,都是相互承认的弹性空间,通过相互承认而在场并共同行动。一旦我们建构起这种合作行动模式,人的共生共在的主题也就得到了诠释,甚至可以说破题了。

(责任编辑:杨嵘均)

Guiding Principles for Action in a Highly Complicated Society

ZHANG Kang-zhi

Abstract: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post-industrialization, the society has become extremely complex and indeterminate: we are facing a society full of risks. Under this condition, we have to establish a set of guiding principles for our action before we know what actions to take and how to make for a sound development through taking these action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since the modern times has been made under the principle of identity and universality and the elements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have been recognized as the abstract and atomic individuals in our metaphysical reflection on the issue. However, the society is not isolated from human beings but rather exists in the life and activities of social subjects. The extreme complexity and indeterminacy of society is embodied in the social aspects of human life and activities and requires human beings to achieve a symbiotic existenc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symbiotic requirement of human beings will rise above the limitations faced by 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 egoism and altruism and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observer and the participant in social practice, thus engaging each individual in the social action and achieving a social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symbiotic existence and collaborative action of all the members of a society.

Key words: complexity; indeterminacy; globalization; post-industrialization; symbiotic existence; collaborative action

①② [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第207、207页。